

海南在解放战争中,就全国战场而言不是主要的战区,但其激烈、对峙、战火波及地区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全国主要战场,因而海南社会也就必然受到更深的冲击。解放前夜,海南政局混乱,经济残破,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其渴望解放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

黎明到来前的海南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兴吉



1940年代的海口街头。
(资料图片)

历经艰苦的抗战,1945 年 8 月, 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海南岛内的抗日军民与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憧憬着美好的、和平的新生活。然而和平却迟迟没有到来, 抗战胜利后不久海南岛内战事不断, 人民生活丝毫没有改善; 这就是海南解放的前夜,也是黎明前的海南。

政局:长官走马灯

1948 年 8 月, 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海南改为海南特别行政区的议案,1949 年 1 月正式设立海南特别行政区。委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张未到任。2 月,李汉魂又被委任为该职务,也未到任。直到 3 月陈济棠被任命为该职务,1949 年 4 月,陈济棠就任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任海南特别行政区警备总司令。就任后,成立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 此后又将琼崖 16 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设立督察专员。1949 年 8 月,正式成立海口市市政筹备处,吴道南任主任,同时,撤销岛内的三个行政区公署。1950 年 1 月,海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设在榆林要塞司令部中。

在抗战后期,海南岛内的国共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早已经形成了相互武装对峙的局面。岛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很晚才得知日本宣告投降的消息。冯白驹后来回忆时说:“在日敌投降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电台,失去中央的领导,所以日敌投降了,我们还不知道,因而对日敌投降后,中央的方针、政策如何,我们是得不到的。日敌投降的消息,是我们在打国民党军队中,缴获到的文件中得知的”。

在 1946 年 9 月国军第 46 军撤离海南岛后,岛内共产党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所占领的地区已经占全岛面积的 40% (不包括琼山)。1947 年 3 月,琼纵部队进入五指山区,到 4 月基本上占领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岛中部山区。到 1948 年 10 月,琼崖纵队已经有军队 7500 人(长短枪 3500 支,轻重机枪 145 挺,冲锋枪 29 支,另有火炮若干门),此外还有地方部队约 1400 人。其力量已经足以和岛内国民政府所指挥的军队相抗衡。

海南在解放战争中,就全国战场而言不是主要的战区,但其激烈、对峙、战火波及地区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全国主要战场,因而海南社会也就必然受到更深的冲击。

经济:接收变劫收

海南岛本属于国内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而民国间的长期战乱,加重了经济的残破。抗战结束后,由于日本人在海南岛七年间采取的是近于封岛的政策, 进一步加重了海南经济的空前残破。《海南岛新志》中说:“本岛商业,以交通不便,向不发达,盖以六载沦陷,富商巨贾,逃避一空,岛上经济,益见凋零。胜利光复后,治安恶劣,交通阻塞,遂致商旅裹足,市廛萧条,全岛商业,迄无起色”。

导致战后海南岛经济持续残破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战后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海南社会的空前混乱与停滞;其二是二战后南洋华侨经济受到重创,受此影响,长期以来南洋华侨汇款支撑的海南社会经济缺乏资金的支持,因而战后海南再也没有再出现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的高潮。

在接收方面,海南岛的地区也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混乱的接收过程。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在《海南历史论文集》中指出:“在短短的半年中, 换过三四次以上的接收单位;起先是由‘粤桂南区总部前进指挥所’副总指挥朱晖日主持,不久第四十六军韩练成接收。由于接收变成‘劫收’,第二方面军受降委员会才决定设立海南分会, 派罗奇将军为海南分会主任委员,才稍上轨道。但在罗氏抵任以前,许多设备与物资已被抢劫一空”。云实诚在 1946 年出版的《琼崖纪行》中说:国民政府“经济部和军政部二批人员最先抵琼接收,他们把一切都向日本人手上接收过来。后来交通部、农林部、社会部、粮食部……等都有人来了。他们又分别向经济部、军政部接收人员手上接过来。这一转移,物已第二次少了(第一次为向日人接收)。再过些时日,交通部接收的物资,又有铁路、公路、航政、电讯、运输局……等机关接收专员到了,又来一次转移。一副机器,一个工厂,甚至一部汽车,一只小艇,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转移接收,若干东西都在这样转移接收,手转手中,不知往何处去了。……这些接收与劫收有何区别?”

战后国民政府并无完整的海南岛开发计划,即将接收的

成果转化为海南岛开发的基础,反而因任由各机构基于各自的私利,对日本人所遗留的物资及设施进行瓜分,此点是乱局的本源。

在抗战胜利后的数年间, 国内局势的变化导致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不可能集中在海南的开发中,因而所谓战后的“海南开发”也只是停留在计划的层面上而已。据 1948 年 1 月广州工商辅导处所做的《海南岛经济事业调查报告》,其中对海南当时经济状况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片灰暗。到陈济棠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琼崖行政长官后,虽力图有所振作,以期改善海南岛的落后状况。但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是在风雨飘摇之中,陈济棠在政治上得不到国民党主流派系的支持;经济上受制于国民政府败亡前的窘境,故而其虽曾上任前高调,提出“希望琼籍人士向南洋华侨鼓吹,投资建设琼崖,开办矿务”,明眼人皆可看出这只是政客的两面而已。故而抗战胜利后,所谓海南开发较之战前的海南开发,更是计划书上的计划而已。而随着抗战胜利后,海南开发流于形式的局面,此时期海南经济表现得更加衰败。

从战后的各类资料中反映了海南经济的残破,比如《海南岛新志》记载,当时海南工业项目包括机械业、窑业、油脂业、纺织业、火柴业、纸烟业、制药业、制糖业等,接收后几乎全部停顿。

实际上,在社会生产必需、基础部门方面,一些有价值的设施,也都因抗战后岛内的混乱,处于退步的状态。如在电信方面,《海南岛新志》说:“本岛各都市内,在沦陷期间,不惟均有电话之装置,且各都市间复有长途电话之装置。胜利后,已先后破坏,其已恢复通话者,恐祇海口一市而已,盖所有线路电杆,均被土匪破坏无遗矣”。

国民政府各机构在海南接收的所谓“敌产”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战前海口的工商企业所有的物产、房屋,日军侵入海南后,被日本军队强占,也有一些是被日本企业低价购买的。而这些在抗战胜利之后,都统统被看作“敌伪产业“收归政府各机构所有。查阅战后 1946-1947 年间海南各地方法院的诉讼案件,可以发现房产案件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正是反映了当时混乱的情况。如海南书局在 1939 年 2 月被日本人强占,日本人投降后,书局的主人唐品三回到海口,国民政府却不发还书局给他。最后导致唐氏怏怏而终。据唐氏长子唐南椿先生说:后来多方申诉,虽勉强取回海南书局的房产,但其中的印刷机械则还是被当局搬走,用于《琼崖民国日报》社使用。海南书局由此虽然一直坚持到了海南解放,但已不再是战前那个集印刷、出版、发行、贩卖于一身的大企业,最多只是个贩卖书籍、文具的书店而已。海南在二三十年代所积累的民营工商业一破坏于抗战中日本人的侵占,二破坏于战后国民政府的接收。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这一时期,海口市没有出现过一栋知名的建筑,也可见民营工商业的衰落。

文化:停滞乃至倒退

抗战后,海南社会原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岛内外动荡的时局,致使海南文化方面也处于停滞不前,乃至于倒退的局面。

在文教方面,抗战中海南小学中有千余所被迫停学,同时,因为海口以及各主要县城都被日军占领,所以造成海口的六所中学以及各县中学完全停止教学。抗战结束后,受破坏的教育虽有所恢复,但速度比较缓慢,据《海南岛新志》的统计,至 1946 年 8 月,海口还有 4 所中学没有恢复。

而 1947 年底私立海南大学的创立, 可以看作是抗战后海南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唯一亮点。

抗战胜利后, 以海口为中心的都市中的报纸有所恢复,但数量也不多,据《海南岛新志》说:“本岛新闻事业,殆集中于海口,现有大光、和平、民国三种报纸,最近有其他各报社亦拟计划出版。至其他各县,则几无一略成规模之报纸,以是消息阻塞,居民几无精神食粮可言也”。据笔者的调查,在战后,海口有《琼崖民国日报》,又有《华侨日报》、《天行报》、《和平日报》(琼崖版)、《大光报》、《世纪晚报》等报纸。

抗战后海南社会经济文化都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社会经济更是空前的残破,海南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其渴望改变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战前海南最大的印刷、出版、图书销售机构海南书局主人唐品三长子唐南椿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战后海南书局得以恢复,其父唐品三去世后,他主持书局的业务。此时的他虽是海口市的私营业主,但思想进步,曾经将奎宁等贵重药品从秘密途径辗转送到琼崖纵队。可见当时海南人民欢迎解放,要求变革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啊。